

上编 傣文历史档案

第一章 傣文历史档案的形成

第一节 傣族文字的创制和发展

一、傣族文字的类型

傣族古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来源于印度的巴利文。新中国建立前，傣族在不同的地区使用着四种不同形体的老傣文，这四种文字皆自左向右横书，行序自上而下。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使用的叫傣泐文，现称西双版纳傣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及景谷、沧源、双江、耿马、镇康等县的部分傣族地区使用的为傣纳文，现称德宏傣文；在德宏的瑞丽县及潞西县遮放以南地区和澜沧、耿马县一部分地区使用的叫傣绷文；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平县等地傣族中使用的叫金平傣文。这四种老傣文虽然都是从印度字母蜕化而来，但形体却不相同。傣泐文和傣绷文为圆形字母，傣纳文为方形字母，金平傣文则方圆兼备，有的还呈尖角形。傣泐文最初只有 41 个字母，与古印度的巴利文字母的读音和顺序一致。后根据傣语特点增添到

56个字母，其中有七个元音字母，一个字母代表带辅音尾韵母，有48个辅音字母因所拼声调高低而区分为两个组，各拼三个声调，只用两个声调符号。傣纳文有19个辅音字母和45个元音字母及常用韵母符号，这种文字常用同一字母表示不同音位，也用几个字母表示同一音位，没有声调符号。傣绷文在文字体系上与傣纳文比较接近，只有18个辅音字母、八个元音字母和两个韵母符号，由这些元音字母和韵母符号再组合成其他许多复合的韵母符号。金平傣文则有44个辅音字母（另有几个同音异体字母）、92个元音字母和韵母符号，还有三个声调符号，辅音字母也分高低两组。这四种傣文在书写中都有许多合体字和形体固定的字，但在书法上有一定规范。

属于印度字母的各种文字，字母表上一般只列辅音字母，而且这些字母单念时都带有一个元音 a。由于辅音字母单独可发音，一些文字学家将其列入辅音文字一类，其实这样做并不恰当，因为元音字母虽不列入字母表，但一点也没有减少它们在拼音中的作用，因此，仍应归入拼音文字一类。傣泐文最初的41个字母表中列有七个元音字母和一个代表韵母的字母，这与巴利文字母表排列形式完全相同，只是巴利文有字母而无字形，在佛教经典翻译中各个国家和各民族都用自己的文字去拼写巴利语，因此，这种文字也不能说直接来源于巴利文，仍将其归入印度字母较确切。显然，这种文字与小乘佛教的传播更为密切，它一直在近邻的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经典文字的特殊地位。^①

除上述四种老傣文外，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的《新平县百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综合》一文记载，1934

参见张公瑾（傣族文化）第二章“语言、文字和文献”，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

年德国牧师贝里泰夫妇在四区仙河村传教，贝里泰与刀丕训还曾合作翻译过有关宗教的书籍，创造过一种花腰文，为拼音文字。刘以在《关于新平傣文的调查与核实》一文中说：经过反复的调查与核实，我们对“花腰文”或称“新平傣文”的情况进行核实，现在可以这样说：“花腰文”或“新平傣文”系解放前，在新平第四区传教的基督教“内地会”德国牧师贝里泰及夫人贝里德，与当地傣族知识分子刀丕训，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当地傣语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因产于新平的漠沙，故被称为新平傣文。新平的漠沙、嘎沙地区的傣族，因其服饰，又称为“花腰傣”。故这样的傣文，也有称“花腰文”或“花腰傣文”的。新平傣文相对于傣泐文、傣纳文和金平傣文来说影响不大，仅在新平的漠沙等部分地区的基督教中传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①

二、傣族古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傣族古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中后期。那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简单，活动范围不大，人们的生活、生产、分配都在较小范围内进行，凭头脑记事，用语言进行交流基本上可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际范围的扩大，头脑记事和语言交流逐渐表现出局限性，为了更好地传达这种社会信息，傣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摸索出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傣族最古老的两种文字：象形字与数字文。

古象形文字的产生可以从傣族诗歌的产生以及爱情的传达方式中找到线索。傣文古籍《论傣族诗歌》记载，在用酸角籽计数

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六辑。

的时代，人们从抬野兽、拖木料的叫喊声中逐渐产生了诗歌。那时，人们见什么就唱什么，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在劳动、生活、娱乐中有了歌，有了爱。但又没有办法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诗歌传达给远方的情人。于是创造出了“叁”这种形式的求爱与求婚的书。“叁”分为“叁糯埋”（草花情书）、“叁敦糯埋”（花树情书）、叁默（有固定的书写格式，每行限于三至四字）、叁帕（转写情书）、叁烘（凤凰情书）、叁糯列（鹦鹉情书）六种，其中凤凰情书最受傣族欢迎。刀正乐先生收藏的《古代凤凰情书》的封面上写着“男女青年相爱时用叶子写好情书派鹦鹉送去。”书中写道，凤凰情书中的一对凤凰，右边一只表示男的，即凤；左边一只代表女方，即凰。男青年向女青年求婚时，画脖子扭在一起，嘴对嘴的一对凤凰寄去向女青年求婚。并说，如果女方同意，她就画两只身体依偎，脖子扭在一起，两嘴同衔一朵鲜花的凤凰表示心心相印。假如对方不同意或已有了恋人，那么就画一对脖子扭在一起，嘴仍对着嘴，但要把代表女方的凰（左边的凰）的背转过来对着右边的凤（代表男方，即求婚者）。《古代凤凰情书》客观地说明了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凤凰情书是用在叶子上画象征爱情的凤凰向对方表示爱慕和求婚。这种凤凰图画实际上就是傣族的图画文。图画文是把一个复杂的事情或事件集中在一幅画中，但不给图画的内容作语言描述，图画只求形似，不求逼真。它本身没有固定的读音，排列组合与相关的词语的语法顺序位置也不相一致，图画记事（或图画文）仅起到帮助人们记事及识事的作用。傣族社会再向前发展，西双版纳傣族先民为适应发展了的社会在图画文的基础上创造了象形文字。西双版纳州政协西娜同志在《布南丝》中发现了傣族的象形文字。继而周厚坤也在景洪县曼阁中心佛寺收藏的傣泐文书籍中找到了《布南丝》（挑选嫁娶吉日）。书中记录了以 60 个为一组的象形文字，但 60 个为一组的象形文字中只重复使用五个象形

文字。

傣族在创制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后期又创制了数字文。傣族老知识分子岩捧先生收藏的傣文文献《波腊纳坦》一书记载了西双版纳傣族的指示字的产生和符号。书中记载，傣族的数字是由集体劳动，平均分配食物或财产中产生的。傣族先民分配实物时用日常使用的竹箴片和常见的相思豆或酸角籽表示数字，并用它们来对食物或财产进行分配。人们分几样东西，分一样就在每份上加“1”条竹箴片，满10就在“1”条竹片后面加一粒相思豆或酸角籽表示10。如要分三样东西，每分一样就在每份上放上“1”条竹箴片，三样东西分完了，每份上都应有“111”条竹箴片。否则，就是这一份分多或分少了。

人们为了记数方便，继摆竹箴片后又发明了用点（·）表示相思豆或酸角籽作记数符号。如1后面加一点（1·）点代表10，1后面平行加两个点（1··）表示100。摆竹箴片或相思豆及酸角籽是傣族先民最简单的指示字——数字的概念和对数的应用。用（·）代表零（0）计数则是傣族对数字的发展。在实际生活中，摆竹箴片和相思豆或酸角籽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病。例如，分的東西多了，要的竹箴片和相思豆或酸角籽就越多，多而易失。由此，造成混乱和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为了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人们在实践中用折箴片算法代替了摆竹箴片算法，后来发展成了傣族数字文符号。数字文是怎样形成的？《波腊纳坦》一书作了如下说明：“由于折断箴片摆放的方法很易丢失和混乱，才想出在一根竹箴片上按照所要记物资的数量多少折成相应的几节。如有三样东西，就在一根箴片上来回折三节；若是八样东西，就在箴片上来回折八节。以后人们才用火炭照着模样画下来，天长

日久就被人们所牢记，变成最初的数字文了。”^①

在最初的数字文和少量的象形文无法清楚表达意思的情况下，还“以物传递信息”。通常是用日常生活接触得较多的一些物件，如鸡毛、火炭、辣子、芭蕉、槟榔、甘蔗等等。传递的方法与作用是：例如某一地区发生战争，局势很紧急时，是以一根鸡毛加火炭派人送往，表示告急求援。对方接到物后就明白这种意思。送槟榔、甘蔗和芭蕉，是表示友好的象征。如送去一包红辣子，却是表示愤慨或断绝关系的意思。以物传递信息还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等方面，如表示这块地或这棵树是自己的就插上一根木叉作为符号等等。古代傣族这种以物代替符号传递信息的方式，还一直延续到西双版纳解放初期。这是历史上傣泐文创制和使用的最初阶段，早期的这些“字文”、“象形文”的形成，标志着傣族社会及文化前进了一大步，为以后傣文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算是第一阶段。^②

三、最初傣文字的诞生

根据有关傣文史料记载，在佛经传入傣族地区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傣族就有自己的原始字母，名称有两种叫法即“多蒙嘎端（虫蛙叶文字）”和“多广抱（吹火筒文字）”，有关的传说有三种：

一说傣文是“盘坝”（猎人）发明创造的。有个箭法高超的猎人，为了记住打死多少动物，就想出了用相思豆粘贴在弓弩上的办法，打得一个动物，就取一粒相思豆用树浆把它粘在弩上作

见周厚坤（试论西双版纳傣泐文的产生与完善）一文，载于《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

见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六辑。

记号。不料，这种粘法容易被树枝野漆挂掉。猎人为此沉入冥思苦想中，一次他到一棵树下休息，偶然发现一条小虫在芋叶上蛀食，给叶片留下弯弯扭扭的斑痕，猎人从中得到启发，模仿虫蛀叶留下的那些符号，用硬刺在叶片上把符号划下来，用作记物的符号。后来被传开，借用的人越来越多，天长日久，就演变成为文字符号，被人们称作“多蒙嘎端”（虫蛀叶文字），成了傣族最早的文字。

二说是一个烧火的人发明了文字，即“多广抱扎刀”意为“吹火筒印灰文字”，后被人们称为“多广抱”即“吹火筒文字”。相传，傣族祖先由游猎转入建寨定居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会煮饭的男人，每次大家上山打猎或种地时，总把他留下煮饭，他煮饭生火时砍来竹子做吹火筒。他做的吹火筒一头是圆形，一头是半圆形。他在无事时，就拨弄手中的吹火筒玩，用吹火筒的两头在灰中按，结果印出一排圆形和半圆形来。这样他从中得到启发，于是就用火炭模仿吹火筒的印痕在木头上作记号，以后，又把圆形和半圆形的符号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许多不同形体的符号，并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一代传一代，就成了以后的傣文。

三说傣文还是“盘坝”（猎人）发明的即“多托我”，意为豆芽形字。相传，古时有个猎人，家住南山脚下，每天都到北山森林去打猎，南山到北山的途中有一塘清澈的湖水，湖中长满了荷叶，猎人每次从湖边经过时，总看见小虫子爬在荷叶上蠕动，而叶片上却留下许多豆芽似的斑点，那些斑点就印在猎人的脑海里，猎人受到启发，就想到利用它来做符号记物记事。一次猎人在家里静静回想荷叶上的“豆芽”，想起一个，就用火炭写下一个，几天以后，他家的房梁上、墙壁上和门板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极像豆芽，就命名为“多托我”（豆芽形文字）。据说，现在的傣文字母，就是从猎人发明的豆芽符号演变而成的。

上述关于傣族三种文字由来的传说，虽不能作为文字发明、创制的依据，可是，从目前现存的傣文史料记载证实，早在佛经传入傣族地区以前，傣族不但已有自己的古老文字即数字文和象形文，而且还发明创制了字母。据傣文史料贝叶本《巴塔麻嘎波罕》、《尚嘎哈奔罗》和《波腊纳坦》等书记载说明：“傣文字母诞生于荷叶之说，是指人看见虫在荷叶上蛀食留下的斑点痕迹受到启发，由此才使人发明创制出了文字。”因此，有理由分析，傣族文字是傣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自己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人很可能是一位有经验有智慧的猎人，在虫蛀叶的媒介下受到启示，发明了文字。

傣文史料《巴塔麻嘎波罕》一书里还记录下了当时的字母形状，还加上了简短说明：“那时字母还只是如同虫蛀食树叶，并不十分清楚，人们谁也不去注意它”，《尚嘎哈奔罗》一书里，对傣文字母起源于荷叶一事，这样记载，“最早傣文起源于荷花，因为虫在荷叶上蛀食留下弯弯曲曲痕迹给人们启发，傣族的智慧者们才创造出了文字”，对此，《巴塔麻嘎波罕》一书又作了这样的记叙：“虫蛀叶文字产生于荷叶以后，五朵荷花也在菩提树下的金殿上开了，据说那是亚洲的中心，示意着五尊佛祖要诞生

原始傣文字母先于小乘教传入傣族地区以前产生，可以从傣文史料《日腊沙刹纳毫》（贝叶本）一书得到证实。此书有这样的记载：“初时，人无语言和文字，从“阿底哈嘎班哑”以来才有语言，‘多蒙嘎端’（虫蛀叶文字）产生以后，人才开始用简单 aul 发音，发音部位在喉咙。过五百年以后，玛哈嘎加牙纳听又根据荷叶文字创造出 41 个（辅音）字母，用以记录佛祖的圣藏经”。这里谈到“玛哈嘎加牙纳听”，此人并不是傣族，他是释迦牟尼佛祖的四大弟子之一，他是为佛经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之一，据传，佛经文字是他创造的。后人在总结傣族文字

的创制和发展时谈到他，也是免不了的。但是（目腊沙剌纳竜）一书仍然说他是在傣文字母诞生形成五百年之后，又才根据“荷叶文字”创造出佛经文字的。

从上述几种傣族史料记载中分析，就更有把握判定：原始傣文字母并非外借梵文，而是佛经传入以前就有。同时也从另一角度上证实了关于“猎人创造文字”和“吹火筒印灰文字”的传说，是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这可算作傣族文字产生形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除上述三种传说外，还有一种有关傣族文字的由来是“去向佛祖讨文字”的说法。即古时候没有文字，人们就去向佛祖乞讨文字。不同民族，带着不同的装文字的工具，汉族带纸，傣族带贝叶，哈尼族带牛皮。来到佛祖居住的山洞，他们说明来意，佛祖就分别在纸上、贝叶和牛皮上写下同一种文字，人们在回来的途中洒水过江，汉人的纸被水浸湿，写在纸上的字变了形，看不清了。只好在河水沙滩边找到雀脚印，就以雀脚印当文字使用，成了鸡爪字；哈尼族带的牛皮，由于途中肚子饿，把牛皮烧吃了，所以哈尼族至今无文字；只有刻在贝叶上的文字不怕水湿，把佛祖给的文字原样保存下来，成了今天的傣文字体。这个传说并非傣族文字由来的原本传说，它反映的内容是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初期的情况。^①

四、巴利文的引进

佛经文字是怎样传入傣族地区，并与傣族文字相结合的，据傣文史料贝叶本《及打撒达》（即《人体解剖学》）、《惟乃洛勒》（即《论律学》）、《沙打惟玛腊》（即《语言字典律注释》）等书记

^① 见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志资料》第六辑。

载，都比较清楚地讲到有关佛经文字传入傣族地区的详细经过，书中说，帕召果达麻即释迦牟尼成佛后的 45 年，到 80 岁涅槃（逝世）的时候，睡在勐古西纳来花园里一棵大树下的石块上面。逝世前那天早上，由他的一个大弟子玛哈阿念达听把众僧侣召集来，听佛祖临别忠告。佛祖说：“我涅槃以后，佛经就将是佛法的三大圣藏经，你们要继承下来传播五千年”。佛祖说完就涅槃了。但是，那时的佛经无文字记载，一切全凭记忆传诵，为了记载佛经语言，继承保护佛祖的三大藏经，于是，玛哈嘎加牙纳听就根据最初“aul’，的发音模式，首先创造出了 41 个梵文字母，分作六种，并从中抽出八个字母编为八个单元音即“a”至“o”，然后又以这 41 个字母作为尾音分化出若干个闭音节来。遵照佛祖临终嘱托，由玛哈阿念达听主讲佛三藏的内容，由玛哈嘎加牙纳听记录，编撰成流传至今的“桑比达嘎”即《三藏圣经》，共包罗八万四千册。接着玛哈嘎加牙纳听就按佛经的内容分成“别干比”即“八大宗类”。作为对三大圣藏经的注释，以便注明意思，好传遍全球，使人容易接受。据傣文史料《目腊沙刹纳毫》一书所记：说佛祖死后五百年，佛法才被载入文字，又说，随着佛历 2005 年（公元 18 年）佛经由水路传入傣族地区，佛经梵文体字母才被傣族所接受。41 个巴利文辅音字母的传入，充实了傣族文字，对推动傣族文字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单靠 41 个巴利文字母，不足以准确表达和反映傣语实际，于是，就出现了一次语言和文字再增创的变化时期，即傣历 639 年（公元 1277 年），名叫阿雅坦孙洛的高僧，又增创了 15 个傣文辅音字母和 11 个元音符号，进一步发展了傣文。至此，傣泐文才得到完整和充实，形成傣族固定的文字系统，这是傣泐文产

生发展的最后阶段 ①。

五、老傣文的最终形成和进一步应用与发展

傣族地区现存四种老傣文中，以傣泐文的历史最为悠久。据傣文古籍《多拉维梯》等文献记载，傣泐文始用于傣历 639 年，即元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这与汉文史籍上记载的材料基本上是吻合的。元代的汉文史籍虽然没有记载当时的彻里（或车里，即今以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全境）使用傣文的直接材料，但在元代《经世大典·招捕总录》中却有一条比较可信的旁证，能够说明当时西双版纳已使用傣文。这就是该书“八百媳妇”条记载元代忽刺丁于元延祐元年（公元 1314 年）出使八百媳妇国，临归国时，其国王“浑乞滥手书白夷字奏章，献二象。合部曲浑乞漏、浑八刺、我童赛、爱章阑随使者赴阙”。八百媳妇国也就是今天泰国北部以清莱、清迈、景线一带为中心的当时景线王国，也称为清迈王国或兰那泰王国，历史上与西双版纳境域相接，民族相同，语言相通。公元 1160 年傣族首领叭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一带建都时，兰那与西双版纳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曾长期结为同盟，文化发展水平也称并驾齐驱，互相间有姻亲关系。当时八百媳妇国主既已在奏章上使用白夷字，也就是傣文，那么，当时的车里与之频繁交往，来往文书也必然使用傣文。再进一步说，既然当时官方文书中已使用傣文，则傣文之创制年代也必定在这时间之前若干年，这正是傣文史籍所记载的傣文创始之年。可见西双版纳在 13 世纪后半叶已使用傣泐文是不成问题的。但从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历史资料来看，傣泐文创制的时间有可能还要早一些，因为这种文字是随着小乘佛教的传播而创制的，

① 见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料》第六辑。

并直接应用于天文历法传播与计算中。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的时间大约在公元 6~8 世纪。而公元 638 年又是傣历的起始年，并且傣泐文形体较之中南半岛各国所使用的梵文系统的各种文字的字母形体（如泰文、老挝文）更为古老，至今在老挝和泰国北部仍被视为经典文字，使用于佛教经典中。再考虑到公元 6~8 世纪是傣族社会的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文化发展的某些平衡现象来看，并不排斥傣泐文的创制年代就是在这个阶段，只是现在还缺乏直接的证明材料，有待进一步考证。

傣那文的创制和使用时间要晚一些，比较可靠的时间是公元 14 世纪。明代李思聪著（白夷传）所记之“緬书”实际上也就是傣那文。因为傣语和緬语属于不同语族，语言差别很大，虽然傣语中有一部分緬语借词，但傣族社会历史上并没有哪一个时期曾用緬语、緬文作为交际工具。另从明代官方所设翻译外国或境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机构“四夷馆”来看，其中既设“緬甸馆”，又设“白夷馆”，在稍后一些的（华夷译语）中，既有緬甸译语，也有白夷译语，滇南方面还有车里译语，可见当时緬文、傣文早已并行而不悖。至于“旁行为记”的习惯，在今所见傣文抄本中仍习用不变，如段落要点、小节标题等都斜书于正文之侧，与《白夷传》所记的相同。这是当时民间还盛行“刻竹木”的计事方法，使用傣文还不普遍。李思聪偕钱古训去滇西的时间是明洪武二十九年，即公元 1396 年，傣那文那时已经在官方使用也不成问题。那么，傣那文的创制年代当然比这个时间还要早一些。

傣绷文与緬甸掸邦的掸文基本相同。掸邦是緬甸最大的一个自治邦，掸族是緬甸的第三大民族，在公元 1287 年至 1537 年近二百五十年间，在緬甸历史上称为掸族统治时期，而且也有较高的文化，因此，傣文的起源也一定很古老。至于金平傣文，由于

资料不足，其创始年代还不清楚。^①

到了清代，傣文使用更为普遍。《东华录》记乾隆十六年（公元 1715 年）十月己未云南巡抚爱必达奏：“采集番字，镇沅府之夷，普洱府之车里，东川府之罗罗，顺宁府之猛甸、猛麻，永昌府之耿马、镇康、潞江、芒市、勐卯、遮放、干崖、南甸、盏达、陇川、孟定、湾甸、猛猛十八种，内遮放与勐卯二种，盏达、陇川与南甸三种，猛猛与湾甸二种，字体相同，汇成书一十四本进呈。”这里的“番字”只可能是傣文，因为上列各地，除“东川府之罗罗”外，均为傣族分布地区，说明当时傣文流行已十分广泛，但字体书写上则有不同之处。周裕在《从征缅甸日记》中说：“通事谙缅文者少，军中每将缅翻摆夷文字，又以摆夷文翻汉文，重译而得之。”这记载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公元 1768 年）入缅清军在德宏及邻近境内的事，它说明傣文的使用已极为普遍，在清军中的“通事”懂傣文的多，懂缅文的少，而缅、傣文是为两种文字，所以必需重译。

新中国成立后，曾选傣泐文和傣那文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新傣文现已在有关地区推广使用，西双版纳地区则新、老傣文并用。傣文在历史上曾起过保存、发展傣族文化成果的作用。用老傣文所形成的大量历史档案文献，是傣族悠久文化的丰富宝库，也是傣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珍贵史料。

参见张公瑾《傣族文化》第二章“语言、文字和文献”，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

第二节 傣族文字的应用与傣文历史档案的产生

一、傣族经典文字与傣文历史档案

西双版纳的傣泐文在当地和我国大部分傣族地区及泰国、老挝、缅北又称为“多沓姆”。“沓姆”意为佛经，“多沓姆”即经书文字之意。这个名称意味着它与小乘佛教的密切关系。虽然后来不管是佛寺、官场或民间都普遍使用这种文字，但从起源上来看，这首先是作为专写佛经的书写工具使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字不仅使用于我国西双版纳等傣族地区，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和缅甸的景栋。使用于清迈的称为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称为傣痕文。景洪、清迈、景栋三个地区的文字差别极小，据 1933 年嘎比滇·沙兰所著《傣泐文·傣允文与老挝文对译课本》所示，傣泐文与傣允文的不同之处只是有四五个符号。再据 1983 年泰国出版的傣文（考古）杂志第二十六期上冈尼嘎·维蒙格宋《兰那经文撰写为标准傣文的意见》一文，其中介绍的兰那经文与傣泐文的差别也只有七八个符号。而且，由于这两地历史上交往频繁，现在这些书法上的差别对两个地区来说都习以为常了，并且已经互相渗透、互相通用了。

傣痕文与傣泐文的差别更小，据易家乐所作《傣痕语音文字纲要》一文，傣痕文也只有代表 [s] 辅音的两个字母在写法上不同于傣泐文，可见这三个地区文字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老挝有自己的老挝文，但他们在宗教上所使用的经文也与傣泐文基本相同。从老挝国家出版局出版的《老挝语》四册课文的第四册所包括的经典文字来看，字母表中与傣泐文有差别的只有七个符号，而且其中两个是受傣文影响结果，其他几个纯粹是书法上的

变异。

从上述情况看，傣泐文、傣仂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经文虽有四个名称，但字母形式以至拼写方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也就是人们所通称的“经典文字”或“经典傣文”。我国的西双版纳与清迈、景栋以及老挝都通用经典傣文是有历史背景的。西双版纳旧名车里，车里的区域在历史上屡有变化，方国瑜在《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中说：“考车里境域，明代较清为广廓，元代又较明为广廓；盖元代之车里，包括有孟艮地，明设孟艮府。”孟艮即勐痕，就在景栋一带，可见明代以前，景栋包括在车里境域之内，同属元代设置的车里总管府。至于清迈一带，元时已设“八百等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八百媳妇全境，清迈就是八百（兰那）的首邑。八百媳妇在车里之南，与车里挤挨着，两者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据傣文《泐史》记载，1160年傣族首领叭真家在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建都时，孟艮、八百、老挝皆受其统治。方国瑜据此指出“景龙、孟艮、猛交、猛老是叭真家族的统治区域，也就是景龙国的版图，即包括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①，故可见历史上这几个地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他们使用同一种文字是很自然的。

很显然，经典文字必与宗教的传播有关。世界上大多数文字形式的传播、扩散大都与宗教有联系，如阿拉伯字母与伊斯兰教，拉丁字母与天主教，斯拉夫字母与东正教，印度字母与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南半岛和我国傣族、布朗族都信仰小乘佛教，他们的文字也都采用印度字母，其文字形式也都是从纪元前印度所使用的婆罗米字母演化而来，这个总的情况，已经相当明朗。但是，中南半岛这几种文字和婆罗米字母形式已经差别很大，它们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第20页。

已成为自成体系的一种中南半岛变体。这些文字有多种形式和名称，其中主要的有缅甸文、柬埔寨文、孟文、泰文、老挝文和傣文。这大概与佛教的传播路线有关，婆罗米字母因不同走向而分为南北两系，传到中南半岛后又分作两个系统，其一是从南系而来的古代吉蔑文；其二是从北系而来的古代孟文。古代吉蔑文后来演化为人们所说的碑铭吉蔑文和寺院吉蔑文，现代柬埔寨文即从碑铭吉蔑文演化而来。古代孟文则演化为泰登文和缅甸文。经典傣文即隶属于孟缅这个系统。孟文、缅文、经典傣文（傣泐文）从辅音字母、元音字母、元音符号或数字形式来看，都极为近似，可以说明这三种文字之间非常亲近的渊源关系。而其数字形式，经典傣文和缅文完全一样，并与泰国、老挝的文字存在明显的差别。缅文在历史上也是有过改革的，至少曾存在过另一种近似藏文字母形式的文字，但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不过，现代缅文和经典傣文一样来自孟族文字则是无疑的。

在西双版纳等地使用的傣泐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穿插着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就是在《华夷译语》中，有《车里译语》和《八百译语》，其中保存了当时西双版纳和清迈两地所使用的文字。这两种文字很接近，但与经典傣文差异较大。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我们只要参照现在老挝的老族以及国内双江、耿马、镇康等地的傣族都同时存在两种文字的现象就可得到解释。老挝或国内这些地区的傣族，他们在寺院中使用经典傣文，而在民间又使用另一种文字，老挝使用现代老挝文，国内双江、耿马等地傣族使用傣那文，这种双重文字制，正是过去西双版纳和清迈文字情况的写照。他们原来也是使用两种文字，一种就是寺庙中使用的经典文字，另一种则是（华夷译语）中在官场和民间使用的文字，后来由于宗教势力深入到统治阶级和民间中去，经典文字逐渐取代了民间文字，使上述西双版纳、清迈、景栋这个三角地带只保存了一种经典文字。这个取代过程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

以说明：靠近西双版纳的孟连县的傣族人，是从德宏地区迁移来的，他们原来在佛寺使用经典傣文，在民间也使用起经典傣文了。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历史上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典傣文现有 56 个字母，要是按巴利语的文字字母系统来说，原来只有 41 个字母，后面的 15 个字母是为标写傣语语音而增加的。这 15 个字母是何时增加进去的现在还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在经典文字取代民间文字过程中为适应傣语特点而加上去的。从单纯译写巴利语经典到准确表达傣语，促进了傣族文字的发展，因此，现代傣泐文（以及傣仂文、傣痕文）既写经典，又用于民间，是一种僧俗共用的文字。中间也有改进的，就是增添了 15 个字母，但作为经典文字的基本面貌改动并不大。傣文文献《多拉维梯》中记载，傣泐文创制于傣历 639 年，即公元 1277 年。这个时间与速可台王国第一代君主拉玛甘亨改革泰文几乎同时，拉玛甘亨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拉玛甘亨碑”，该碑立于 1283 年，现被认为是泰文创始之年，也正是刀芒莱的清迈政权鼎盛时期。看来，在那场席卷大半个半岛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风云中，车里、八百、速口台在文化上互相间也有影响和渗透，于是进行了一场带有普遍性的文字改革运动。拉玛甘亨以其留下的碑铭来作这场改革的证明。而车里和八百没有留下这样的材料，但（多拉维梯）的记载却说明的确有过这样一场改革，改革的成果就是留在《车里译语》中在官场和民间通行的文字。后人对这些改革运动都称之为创制或创始，这对树立新文字的权威是有必要的。由于车里、八百、速口台之间互有影响，所以两种译语文字与拉玛甘亨碑铭文字及后来的泰、老文字比较接近。至于经典文字，起初因藏之于梵门深院，以宗教所固有的顽固性和保守性而照原样保存下来，后来由于宗教在当地的普及，经典文字终于取代了译语文字。

因此，经典文字的创制时间当在 13 世纪之前。如上述，具